

# 畸变的效益链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主编 韩朝华

张冀湘 郑文平 汪海粟 著



23.9  
9

责任编辑 嵇浩存  
监 印 夏书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畸变的效益链**

张冀湘 郑文平 汪海粟 著

\*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4号)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

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3.75

印数:00001-50000册 字数:84千字

ISBN7-80060-317-2/F·44 定价:1.35元

##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顾 问      厉以宁    周叔莲  
主 编      韩朝华  
副主编      张润峰

### 作者小传

张冀湘,男,1953年生,1986年获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著有《行业经济学》和论文多篇。

郑文平,男,1958年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已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汪海粟,男,1954年生,1983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现留校任该系讲师,曾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

## 前 言

从70年代末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胜利在望,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渴望了解的问题。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辰有明显区别。他们有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

中国人素好浓描成功,淡写失误。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似乎成了部分中国人反映现实的准则。中国人惯于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困境和难题归咎于

前辈，则又是某些人评论现实的规矩。中国人擅长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人应付现实的方式。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社会人格。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它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的得失，探寻扫除障碍的途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通俗读物。它的宗旨是将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但不熟悉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士服务。这套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科学性和开拓性，又具有大众性和可读性。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启发。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

韩朝华

1988年12月于北京

# 目 录

<b>一、坎坷征程</b> .....	( 1 )
(一)龙年“险象” .....	( 1 )
(二)前车之鉴 .....	( 12 )
(三)高价腾飞 .....	( 17 )
<b>二、校准座标</b> .....	( 19 )
(一)焦点:产出与投入的比值 .....	( 19 )
(二)角度:效益的立足点 .....	( 24 )
(三)实质:生产力水平 .....	( 27 )
(四)构架:效益系统与效益链 .....	( 32 )
(五)标尺:综合效益指标 .....	( 36 )
<b>三、浮肿的巨人</b> .....	( 40 )
(一)国内纵比 .....	( 40 )
(二)国际横比 .....	( 50 )
(三)高速度增长中的效益幻觉 .....	( 55 )
<b>四、浅层诊断</b> .....	( 60 )
(一)失衡的产业结构 .....	( 60 )
(二)停滞的产业技术 .....	( 65 )
(三)涣散的产业组织 .....	( 66 )
(四)落后的经营管理 .....	( 69 )
(五)僵化的经济体制 .....	( 71 )
<b>五、深层透视</b> .....	( 75 )
(一)结构转换的震荡 .....	( 75 )

---

(二)体制嬗变的阵痛·····	(79)
(三)改革方略的困惑·····	(83)
(四)政治权力的溃瘍·····	(89)
<b>六、走出困境的选择</b> ·····	<b>(92)</b>
(一)矫正效益观念·····	(93)
(二)深化企业改革·····	(98)
(三)加强行业管理·····	(101)
(四)严格总量控制·····	(106)

---

# 一、坎坷征程

## (一)龙年“险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对它的崇拜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已深深植根于普遍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尽管现在有学者认为，龙的形象与现代化极不协调，现代图腾崇拜会使中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但是，中国百姓对龙的好感并未因之而淡化。每到龙年，中国城乡各地将会出现各种形式的“龙灯会”、“龙舟赛”；“龙之歌”此起彼伏；“龙宴”、“龙餐”、“龙点”层出不穷。人们希望在龙年结为秦晋之好，以便“龙凤呈祥”；年轻夫妇指望龙年生育，以想得“龙子”。似乎龙的神威真的是无时不在，对它越是虔诚，它就越会给你带来吉祥和如意。

1988年，正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第10个年头的时候，又迎来了龙年。人们对这个龙年寄托着希望。新年伊始，各方面对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议论便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中央领导人再三阐述了在龙年的改革中担风险、创难关的坚定决心。观察家们则断言，对1988年的改革决策来讲，“方向已经明确，方案已经就绪，只待考虑快一点还是缓一点，如何更强劲些，更稳妥些。”同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好势头。至1988年6月底，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87年同期增长17.2%。八月和九月工业总产值又分别比1987年同期增长18.3%和20.2%。然而，正当决策层准备借龙年的福佑大展宏图时，经济生活中的“险象”接踵而至。

“险象”之一：通货膨胀，抢购蜂起。

据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1988年上半年，我国的平均通



货膨胀率(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3%。而6月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为19%。大城市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副食品、蔬菜、水果的价格实际增长了30%以上。随之,人民币在各地黑市交易场所的兑换率急剧下降。到8月份,人民币与港币的比价已超过1:1,与美元的比价已达到1:9,1:10。在物价长期稳定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如梦方醒,猛然意识到,购物保值的重要性,从6月份开始,抢购风在全国各地越刮越凶。

6月26日,广州一些商店出现了深夜排队等候购物的“长龙”。佛山市一位农民在玫瑰商场一次就购买电冰箱、空调机、组合音响各4台(套);肇庆市有人为7岁的女孩抢购高档消费品,提前办嫁妆。北京市的雪花牌冰箱残次品也被人排着队抢购走。有的人竟一次购买了3吨食盐。

8月下旬,在济南市场上,从冰箱、彩电、洗衣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到洗衣粉、肥皂等生活用品都成为抢购对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飞涨。全市8月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幅度突破了30%。其中,彩电价格上涨54%,猪肉价格上涨40%,小麦价格上涨38%。

抢购风潮往往与挤兑风潮并存。1988年6月26日,广州的一位个体户一次从储蓄所提款30万元,这天广州全市储蓄额下降了452万元。7月25日至27日,哈尔滨市的储户共提出存款1250万元。7月25日至8月5日,沈阳市工商银行储蓄额下降5200万元。

财经专家王绍飞同志认为:“事实上通货膨胀正在破坏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它将给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年上半年,以不变价计算工业产值增长11.3%,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增长19.1%,财政收入增长11.6%。然而扣除

同期 13.5% 的物价上涨率后,商品销售增长只有 2.1%,生产的东西拿不到市场上去,财政收入也呈负值。”<sup>❶</sup>

“险象”之二:“瓶颈现象”加剧,原材料、能源短缺严重。

请看 1988 年 11 月 20 日《经济参考》的如下报道:

“徐州,除铁路、矿山和市区 10 来个关系全局的企业外,整个工业都瘫痪了,几十万工人没事干,亏损企业迅速增加。”

“常州,7 月份因供电量减少,工业总产值损失 30 亿元。”

“南通,40 多个外贸出口企业因缺电,无法按期交货,被罚款和取消合同。”

“在农业急需化肥的 8 月,全省 40 多家小化肥厂先后停产。”

.....

近年来,江苏省发挥电力部门和地方办电的积极性,每年都有 100 万千瓦的新机组建成投产,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煤炭供应却难以保证。1988 年上半年,全省计划内发电用煤供应缺口为 10%,7 月份扩大到 14%,8 月份又扩大到 20%。

因原料短缺而停工待料的企业更是不胜枚举。1988 年 9 月,全国 90% 的铝制品厂由于铝材供应不足而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许多大城市的烟厂和棉纺厂也因原料问题而开工不足。

“险象”之三:事故迭出,交通梗阻严重。

1988 年交通运输开年不利,铁路、公路、河运、航空相继发生恶性事故。第一季度的元月 7 日,元月 17 日,元月 24 日,3 月 24 日,接连发生四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铁道部长丁关根因而引咎辞职。事

---

❶ 《世界经济导报》,1988 年 8 月 22 日,第 2 版。

故的发生除了有管理不善的主观原因外,交通运输业欠债过多,落后面貌没有根本改观,不能说不是客观原因。以铁路为例,到目前为止,全路仍铺有超期使用的铁轨 12860 公里,占营业延长全程的 21%,急需更换的有 1 万多公里,伤损钢轨 18.3 万根,路基病害达 9.6 万处。不少隧道、桥梁也失修严重,到期而没有厂修的内燃机车、客车、货车,分别占应厂修的 33.8%、44.4%和 20%。1987 年由于设备质量问题造成的行车重大、大事故 19 件,占总数的 36.5%。

由于经济发展过快,运量急速增加,运能严重不足。1988 年以来,从冬运到暑期,我国客运量持续上升,主要干线的特、直快旅客列车平均超员 40%以上,不少近 80%,个别超过 100%。每天有 70 万人站着乘火车,全国铁路出现 20 多个“卡脖子”地段。运输部门解决上述矛盾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大运输强度,提高牵引吨位,加大通过密度。担任晋煤外运任务 47%左右的大同铁路分局,几年来的任务完成量以 10.4%~14.7%的高速度增长,而该分局主要运煤干线北同蒲线的主要设施和机车牵引动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增加。中国的铁路就象一根绷得过紧的弦,一旦超过极限,不可能不断。

中国一连串交通运输事故的出现是整体运输设施不足和效益不高的必然结果。有人认为,工农业产值的增长与铁路货运的增长之比为 1 : 04 是比较合理的,我国多年来落后于这一比例,1988 年上半年又下降到 1 : 03。苏联 1961~1973 年铁路投资占总投资的 63%;日本明治维新时铁路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 55%;美国 20 世纪初在已有 30 万公里铁路线的条件下,铁路建设投资仍占总投资的 50%。而我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长期偏低,并呈下降趋势。“一五”时期为 10.7%,至“六五”时期则下降为 7.0%。从 1950 年到 1987 年,铁路运输

的主要指标换算吨公里增长了 19.3 倍,而铁路营业线总里程只增加了 1.4 倍,机车总功率只增加了 5.6 倍,致使我国铁路面临近期运力不足,远期后劲缺乏的严峻局面。此外,由于缺乏认真的可行性研究和科学的经济评估,有些项目钱花了,线路建成了,而效益很低、浪费惊人。通(辽)霍(林河)线,投资 6 亿元,建成 420 公里,设计能力 2,000 万吨,而实际运量 200 万吨左右,仅为 1/10。

“险象”之四:人口膨胀,就业负担沉重。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回升,计划生育失控、抢生、超生、偷生行为屡见不鲜,人口增加使得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的问题更为突出。到 1988 年,人口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赤字。在中国的今天,每分钟平均有 38 个婴儿呱呱坠地,每天有 55000 个新生命问世,每年净增人口已达 1500 万,相当于 1 个澳大利亚。当龙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国又有了 10.8 亿“龙的传人”。而在 1949 年,中国人口还不到 5.4 亿。38 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解放初,我国农村人均耕地 2.8 亩,现在已下降为 1.4 亩,有 9 个省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我国以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7% 的土地超负荷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比起人均占有 13 亩耕地的美国和人均占有耕地 48 亩的澳大利亚,负担何其沉重。我国每年增产的粮食,约有一半被当年出生的娃娃吃掉。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沈阳、重庆等大城市三代同室的现象比比皆是。

同人口出生率回升并存的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企业大量冗员。中国人面临就业定向、就业成本、就业观念的挑战。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客观要求大量地、减少劳动力,特别是种植业劳动力。有学者估计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达 1 亿人之众。在城镇,仅 1979 年到 1987 年间,就安置就业者 7,000 万

人。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就业制度和集体所有制半市场化的就业制度,掩盖了城镇就业矛盾,超量容纳了占现有城镇职工30%,约4000万冗员,这是现阶段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原因之一。未来12年,我国还将新增适龄就业者1.6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下一个龙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要为总计达3亿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同时,就业成本提高过快和社会财力相对短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中国本来具有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近年来这个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首先,由于分配体制的缺陷,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难以调动,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劳动纪律松懈的现象普遍存在。现代中国人竟以“懒”而闻名于世。其次,工资上升太快,成为“成本推动”的主要因素。1979年到1986年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大体增长了1.2倍,平均每年递增10.1%,其中城镇工业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递增率为10.3%,超过了同年劳动生产率(按每个劳动者创造的资产值计算)平均年递增4.6%的幅度。在农村,就业价格不能表现为工资,但可以近似地体现在人均生活费支出的指标上。抽样调查表明,1986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生活费开支增加了2.1倍,年递增率为15.1%;而同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按每个农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净产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9%,相差8.2个百分点。在此同时,就是资本也不得不随之增长。在1980年到1986年的6年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增加1107万人,增长23.7%。而且企业全部生产资金占用都增加了3916亿元,增长92.5%,后者相当于前者的3.9倍,可以说,就业压力是投资膨胀的社会原因之一。

令人吃惊的是,就在城市企业冗员数千万的情况下,竟有

许多企业在劳动岗位上严重缺员。脏、重、苦、险、报酬低的工作正由 1500 万进城农民担负着,这使本来已很薄弱的城市基础结构更加不堪重负。

“险象”之五:亏损增加,短缺与浪费并存。

据统计,截至 1988 年 7 月底止,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预算内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数达 6364 家,亏损面达 19%,亏损额为 36.37 亿元,超过 1985 年全年亏损数字 27.78 亿元的三分之一强,比 1987 年同期增亏 27%。煤炭、石油部门发生全行业亏损。中央军工和直属企业亏损面和增亏速度又大大超过地方工业。可以断定,1988 年是十年来企业亏损最严重的一年。

“险象”之六:比价复归,农业徘徊不前。

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的改革,近年来,受到工业品轮番涨价的冲击,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正在复归。1988 年,农村并没有出现第一步改革中那种令人心醉的奇迹,农副产品增长缓慢,市场急剧波动,许多城市对肉、蛋等主要副食品恢复了凭票供应的制度。农民怒气颇多,市民牢骚不绝。农业继 1984 年上台阶之后,已连续四年徘徊。

经营农业,效益太低,无疑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江西省三月份将猪肉销价提高 1.6 元,但生猪购价仅提高 0.5 元,而化肥、农药、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都一涨再涨。据中部农村的反映,1987 年同期尿素每吨议价最高不过 700 元,而今年涨到 1100~1200 元,最高达 1300 元。许多农民认为:增施 50 公斤尿素要投入 60 元左右,一年辛辛苦苦不遭灾,一般只能增长 150 公斤稻谷,也只值 60 余元,投入与产出相差无几,等于白干。所以,出现禾随便栽,田粗放作,甚至荒芜土地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价格不合理,等量劳动得不

到等量报酬,弃农经商的比比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日益薄弱、生产条件恶化、发展后劲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据农业部测算: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上,每增长 5000 万吨粮食,必须增加 1500 万吨化肥,130 万吨柴油,116 亿度电的综合投入。可是,农业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60 年代为 16%~20%,70 年代为 11%~12%,80 年代逐步下降为 3%~4%。投资绝对额 1979 年为 57.9 亿元,1987 年只有 42.11 亿元;水利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 60 年代为 10%以上,70 年代为 7.1%,80 年代为 1.9%~2%,而且绝对额也在下降。以这样微薄的投入何以应付农业增长所需的庞大支出?

“险象”之七:投资失控,膨胀与不足共存。

截至 1988 年 8 月底止,全国正在施工的基建项目达 47344 个,投资总额在 7000 亿元以上,按发展势头推算,1988 年投资规模可能突破 4200 亿元,超过国家计划 1200 亿元。目前,我国在建项目所占的投资相当于 1987 年国家财政收入的 3 倍。1979 年至 1987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3%和 8.6%,而固定资产投资则每年平均递增 20%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水平。按“六五”时期基建每亿元投资消耗“三材”的水平推算,1987 年全国 2100 亿元左右的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分别占当年总产量的 50%、29%和 47%。可见,基建规模过大是我国原材料短缺的重要原因。投资增长过快也加剧了消费基金的膨胀。全国有一支 1900 万职工的建筑大军,每年工资、福利开支约 475 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现在每百元基建投资中,约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消费基金的海洋。为了维持投资规模,我国在改革十年中,先是小心翼翼,继

而大张旗鼓向国内外举债。据统计,当前借入一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外债已达 300 亿美元,其中由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约占 60%。借入短期外债 100 多亿美元。从 1981 年起,国家还以发行国库券形式借内债 350 亿元人民币;1987 年发行 100 亿元重点建设债券。曾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的中国,1990 年将面临第一个还债高峰,届时国家财政将承担内债的还本付息 260 亿元人民币,外债还本付息金额将达 70 亿美元。即:国家财政收入的 10%~20%要拿出来还债。许多人士忧心忡忡,担心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险象”之八:分配不公,劳动热情受挫。

改革以来,我们推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对于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的禁锢,焕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新体制尚未完善,旧体制不能不与之共存。二者之间的摩擦使这一政策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分配不公已成为 1988 年以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之一。“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事实。不合理的悬殊收入,已引起广大普通工资收入者和农民的不满。出租汽车司机的工资大大高于公共汽车司机已司空见惯。涉外企业的服务员的收入超过一般企业的中层和机关的处级干部也不足为奇。承租人以几千元的个人财产抵押,在不能有效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竟有的人年收入在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之上。个体户瞒报收入,偷漏税收,牟取暴利的为数不少。高收入阶层的人并未因通货膨胀而受到损害,他们统统有机会把它转移到低收入阶层的身上。低收入阶层中,以教师的状况最为突出,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据测算,教师月工资平均水平排在全国 12 个行业职工工资的倒数第三。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工资外收入也少。这挫伤了教师的积极



性,出现教师“改换门庭”,弃教经商的现象。由于教师待遇太低,知识贬值,新的“读书无用论”再次抬头,学生厌学辍学,教学秩序难以保持。

分配不公不仅表现在个人收入上,而且表现为宏观资源分配的不公。江苏省 107 亿的地方财政收入中,留归地方使用的不到 40 个亿,而广东只上缴 14 亿,地方留成达 80 个亿。今年江苏省的财政预算已有 4 个亿的赤字。考虑到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付钱的事情不少,年终决算的赤字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五五”时期,江苏省的生产性支出占各级财政的 55% 左右,现在已降到 15% 以下。显然,这种地方留成的分配把江苏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沿海地区实行特殊的物价和工资政策,使毗邻地区经济陷入困境,前者用高价购买后者的物资,使物价上扬,而后者的工资制度并未改革,消化不了上涨的物价,实际收入被迫降低。有的地区不得不采取新的地区封闭政策。

“险象”之九:风气不正,党的形象受损。

目前,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风气不正,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

不正之风首先表现为全国各地存在的集团购买力膨胀,奢侈浪费成风。花自己的钱,锱铢必较,花国家的钱,一掷千金。白吃白拿已成为中国流行的一种瘟疫。高级小轿车到处可见。据杭州市楼外楼等三家著名饭店调查,一年之中公费酒宴达 1115 次。其间,257 家单位公费酒席开支共达 25.6 万元。社会集团购买力虽经多次降温,还层层设置了“控制社会集团消费办公室”,但收效甚微。那些我行我素的单位,既控不住也制不了。

不正之风其次表现为企业偷税漏税严重。此风愈演愈烈,